

DOI:10.3969/j.issn.1007-4074.2012.04.016

论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历史生成与式微^{*}

黄 健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507)

摘 要:新派武侠小说的生成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在当时中西方政治矛盾尖锐对立、而港英政府采取“无政策”的政策背景中,香港的文学语境既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是相对开放与自由的。这不仅要求作家具有较敏锐的政治视角,而且也为其创作思考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此时的南来文人满怀被放逐的失意,在文学中展开了对现代国家、民族的想象,表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梁羽生与金庸因家变等因素亦产生类似的心态。种种原因加之一定的“触媒”作用,他们终在传统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但这一小说流派在经历了繁荣期之后,却逐渐走向衰落,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关键词: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创作心态;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4-0080-07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GD10YZW02)

作者简介:黄 健,女,博士,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往往被视为偶然。是梁羽生,这位爱好武侠小说的《大公报》记者,受好友罗孚的邀请,以发生在澳门的一次武功比试为题材而创作了《龙虎斗京华》(1954),开创了该小说流派的源头。紧接着,金庸发表的《书剑恩仇录》(1955)则壮大了它的声势,两人也都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之所以将其与旧派武侠小说区分开来,当初是因为它在艺术上的现代特色。对新派武侠小说有“催生”之功的罗孚指出:“到梁羽生出,才开了用新文艺手法写武侠小说的新境界,使武侠小说改观;金庸继起,又引进了电影手法,变得更有新意。这就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1](P36)}

一、20世纪50年代香港特殊的文化语境

新中国成立以后,香港成为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争抢的地区。但碍于港英政府,它反而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文化空间。“英国政府略微迟疑之后,就

遵循既定的实用主义原则,即承认实际控制其领土的政府,于1950年1月承认了北京的新政权,成为最早承认北京政府的国家之一。”但英国的态度其实是非常暧昧的,它同时“承认台湾的合法性——多年之后,英国才与北京互换大使,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2](P498)}。对于当时香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香港学者郑树森认为:“香港开放、自由、不干预,或可称为‘无政策’的港英文化的政策,使香港成为海峡两岸之间唯一真正较有国际视野的地区。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特殊地理位置,也为海峡两岸之间的往来,提供了国际的层面。其二,香港的自由开放,可以众声争鸣,不论左派、右派、中间派、托派、甚至无政府主义者,都可以自由活动,构成当时华文文学世界中的特殊空间。在当时海峡两岸的政治夹缝中,香港类似公共空间。由于港英政府欠缺一套明确的文艺政策,没有全面强力推行在其他殖民地行之有年的殖民地主义文化霸权,因此才有这个空间的出现。”^{[3](P33-34)}当然,应该看到,港英政府并未对意识形态放任自流,左翼与右翼势力的冲

* 收稿日期:2012-04-03

在线杂志: <http://skxb.jsu.edu.cn>

突是存在的:“左翼分子,即一般所称的共产党同情者,总是受到种种限制;极端的国民党支持者对这个殖民地的安宁威胁更大。”^{[2](P498)}香港学者黄继持也说,当时港英政府“对香港青年的活动、心态均有所控制,尤其对中学看得很紧,当时中学教师稍为左倾,即会被教育司署调查”,因此,在中学里,“‘读书会’活动便相当活跃,虽以政治意识灌输为目的,但主要是通过文艺途径来展示。因此大有助于当时香港青年接触中国大陆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乃至俄苏文学”,可见,“左派的渗透活动并非无效”^{[3](P18)}。再如论及陈梦因与罗孚的友谊,有人写道:“从前《星岛》偏右,《大公》为左,同在香港,同是大报老总,数十年来不相往还,这对老朋友要在几十年后的美国才能痛快地表达友情。香港小如弹丸,两岸夹缝也不宽,为了不同的‘阵营’,好友相隔竟如银汉双星,绝少碰面,也可说是历史的独特现象。”^{[4](P61)}可见,“左”、“右”派别所受到的限制是客观存在的。

与此同时,大量由内地南迁的移民成为新的香港市民,并直接影响着香港经济的发展。据《香港史》记载,当时“新来者蜂拥而至,数年之内人数就达到香港本地人口的4倍。他们占据了一切能够弄到手的设施,给潜心致力于战后重建、时时面临外部压力的殖民地政府带来巨大困难。可以想见,香港当局只是勉强接纳‘寮屋居民’,除了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之外,当局不愿承担更多的义务。黎敦义于1950年进入香港政府部门,是当时的一批新政务官之一,他在1991年《香港年度报告》中叙述了自己的经历:‘我必须设法甄别寮屋居民,重新安置每一个人,为他们提供用4根界桩标出范围的空地,供他们建造住所。政府逐步拨付少量资金,用于清理地基,修建储水管,铺设道路,还做了大量其他工作,但是不提供住房。’”在极大的生存压力下,“新来者大多对政治漠不关心,觉得能够活下来就已是万幸,只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被打扰”^{[2](P496-497)}。显然,当时市民关注的重点不在政治,而在生存,以及深深制约着生存质量的经济状况。

综合前面提到的方方面面,可以归结出香港当时的文学语境存在着这样的特点: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文学与商业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作家要通过文学创作尽快地获得利润,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作品在发行量巨大的报刊上尽早公之于众;而报刊要获得生存,也往往需要与作

家合作,以刊登其文学作品的形式来刺激大众的购买欲,于是便形成了当时香港文学与报刊关系极为密切的局面。这可以从郑树森的概括中得到印象:“香港大众,尤其在五六十年代,‘睇’小说主要从报章副刊;从文艺杂志区‘读’的,则是青年学子,及当时为数不大的‘读书人’。……因此谈香港小说,结合报章杂志,比起单言成书,比较接近本相。”^{[5](P12-13;45)}当然,美国政府也非常看好报刊作为文学阵地的宣传功能,于是在香港推行“美元文化”,即通过资助文人或报社、杂志社的方式来进行思想渗透。在这一政策下,他们的确扶植了一大批刊物,但其作用不仅仅是负面的,也有着对香港文学的促进作用:“香港当时经济相当匮乏,有大量失业人口,很多人三餐不继,但文艺活动反而非常蓬勃,……假如当时没有美国国务院及中央情报局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对香港文化界实施经援,恐怕当时不能出现如此蓬勃的文艺生态。”^[3]还有:“五十年代的青年文艺阅读,表面上好像是‘美元文化’所操控的创作与翻译笼罩一切,其实左派作为潜流,仍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这从《大公报》、《文汇报》等左派报章的文艺副刊长期出版,而且拥有不少读者的情况可见一斑。”^{[3](P18)}

对于报刊消费市场的敏感,使《新晚报》的主编罗孚敏锐地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时机,并最终导致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问世:1954年的“吴陈比武之事”——“五十年代初期的港澳社会还是比较‘静态’的,有这样刺激性的新闻发生,引起的轰动自是可想而知。……由于有擂台比武,间接使澳门的赌场也大发横财,观战的已有五千人,谈论的就更多了。”^{[6](P98)}

由此可见,港人对商业的关注以及港英政府的“放任”政策使当时香港的文学语境偏离了中西方政治斗争的漩涡。通过后人所做的《香港新文学年表(一九五〇—一九六九)》来看,50年代初比较大型的文学讲座都似乎与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多是由英国文化委员会举办的文学讲座,涉及莎士比亚创作等与英国文学研究关系密切的课题。^{[3](P8-64)}这样,作家的创作与读者的接受行为都不会表现出过于激烈的政治色彩。而且,应该看到,许多新移民宁可在香港过着困窘的生活也不“北归”,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因出身、信仰等种种原因,为大陆新政权所排挤:“曾经指挥十万貔貅的,此刻在狮子山下每天打十万石子;曾经执教官立大学的,现在到了私立小学职位也岌岌可危。在

设备、师资一切都不能和后来的合规合格相比,是事实。特别是那些早年念满了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古典中文的知识分子,跑到台湾当达官贵人的秘书、记室,就大写骈四俪六,流落小岛香江作其孺子之牛,就不禁技痒难熬,代‘孩’立言,自鸣其坎坷与理想了。”^{[4](P130)}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文学来抒发或体验失意者的情怀,呼唤英雄的出现,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此处出现的英雄,显然不同于同时期大陆文学中所盛行的强调政治属性的“工农兵”式的“人民英雄”,而是带有对人性善恶更多的观照。这种对政治主流的自觉疏离,对救人于困厄之中的英雄的向往,与传统武侠小说产生的语境是相似的,但不同在于,此时香港的文学语境,是被置于特定时代的国际政治因素的作用之下的,它需要作家具有更敏锐的政治视角,更开阔的思考及对比的空间,它所提供的如阶级论、无政府主义、博爱思想等观念都不会在以往的小说中理性地出现。

二、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的创作心态

报纸副刊的热销养活了一批南下的文人。因为他们大陆时即已成名,因此即便是身处香港,也还是拥有大量南来的“粉丝”。颇具规模的读者群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得以在香港通过卖文的方式养家糊口。以著名作家南宮搏为例,根据《香港新文学年表(一九五〇—一九六九)》的统计,自1952—1954年初短短的两年中,他主要依托《星岛晚报》,共发表《西施》、《貂蝉》、《圆圆曲》等15部历史小说。从作品连载的时间来看,基本上是一部接着一部,没有停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时的南来作家在生活上的困窘。不难看到,这些鼎鼎有名的作家夹杂在难民中辗转来到香港并为生活而发愁时,心中该有多少无奈与失落。对此,香港学者黄继持认为:“香港的商业环境与比较落后的文化景况,的确曾经对南来文人,尤其对‘卖文’为生的作者,造成一定的惶惑乃至挫败感。”^{[3](P12)}即便是在港通过大量的文学创作赢得读者的认可,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但这些文人并不能对香港产生认同感。他们原已视自己为文化精英,香港对于他们来说,是“文化沙漠”,陌生而隔阂的。作为新政权下的失败者,承受着巨大的文化落差,这批作家的创作也免不了与被迫漂泊异乡的孤独感、无助感结合起来。

这些文人们惨淡的心境不能不说是当时香港文学创作心态的重要特点之一,也不可谓对梁、金二人毫无影响。但与这些成名在先的作家有很大区别的是,当时的梁羽生与金庸不过是二十出头的记者,都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被鼎鼎有名的《大公报》给录用的。“当年的《大公报》是知识分子爱读的报纸。”^{[1](P26)}他们年纪轻轻已可在大报上激扬文字,针砭时弊,因此别人那种被放逐感在其身上的表现并不明显。相反,他们意气风发,是颇具指点江山的豪迈之态的。还应注意,选择在一个充满自由精神的著名报社工作,可令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见金、梁二人当初对自由民主精神的重视。当时,该报选择战后在香港复刊,其根本原因应是强调不受政党意见夹击的自由精神。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三人在办报之初便立下誓言:“谁做官谁就得退出《大公报》”,“一九四一年四月,《大公报》获密苏里新闻奖。五月,张、胡联名对美国公众广播,题为《自由与正义万岁》”。梁羽生还回忆说: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香港《大公报》正式复刊。胡政之在亲笔撰写的复刊辞中表白:第一,不满国民党,说:“《大公报》‘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循环内战中,我们不知道受了多少诬蔑。”第二,也反对内战,说:“我们存在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发挥和平统一的理想。”^{[6](P130-131)}

对工作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人内心的追求。尽管年纪不大,但他们的人生经历却是相当丰富的。上世纪40年代的烽烟,以及在炮火中的生生死死,已经让这两位年轻人早早地、深深体会到了人间的不平,并对理想的未来充满渴望。梁羽生曾在抗战期间被迫与情人、也是自己表妹的韦盈分离,从此天各一方,相见无望,在绝望中,他曾写下好些寄托伤感的词作。后人评价此事道:“直到一九四九年他毕业岭大之后,到《大公报》任事,并开始撰写武侠小说,在这悠悠岁月当中,心中总不能忘怀昔年刻骨铭心的遭遇,因此把为表妹所填的词,分别略改一些字句,像‘榕城’改‘江南’之类,嵌入小说里面,将主角际遇配以情爱恩怨的词章,贴切异常,令人读后倍加感动。”^{[7](P128)}冷夏则在《金庸传》中言及金庸青少年时期屡次在学校因为同学打抱不平而被开除的事情,最后一次的被开除甚至使之无法完成自己心爱的外交官学业。种种坎坷的人生际遇不能不令两人在对旧中国充满失

望之余,也对新中国政权充满希望。这在一心想成为外交官、报效国家的查良镛(金庸原名)心里尤为明显。“和当时所有怀抱一腔报国热情的年轻人一样,查良镛觉得家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国家作点事。”“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读书时,查良镛领略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对国民党已没有什么好印象;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节节取胜,以致得到政权后,查良镛对中共政权充满信心。”^{[8](P48-54)}而梁羽生也在岭南大学期间,接受了“左派”的影响,故对共产党的政权也是充满信心的。^{[6](P92-94)}

但是,他们的理想却很快遭到了质疑。先是1950年初,金庸北上求职,希望谋得一份自己梦寐以求的外交官的职位,但因为出身等问题希望落空:“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出贡献……”^{[9](P56)}其中的懊恼与不平是非常明显的。其后,在当年年底,大陆开始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两人的父亲竟均在此运动中被镇压致死。对此后人有这样的记述:

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是大地主,自然也是被清查对象。大批解放军开进袁花镇,他们从查家搜出一支手枪。“共军”认为这支手枪是国民党军官用的,因而断定查枢卿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是一名‘反动地主’,于是对他进行镇压。查枢卿就这样死在中共政权的枪口之下。^{[10](P55)}

我曾听父母聊过,说梁羽生解放初徒步回蒙山,走到半路碰到同学彭荣康,彭告诉他:“你父亲刚被镇压,你回家无异送死,速逃。”梁羽生(那时还叫陈文统)遂星夜逃亡,一路逃到了香港。多年以后,《文史春秋》上刊登了彭荣康回忆文章,与我父母所言大体相符,只是细节上稍有差池。据彭荣康说,1950年秋,他在蒙山的邻县荔浦碰到了梁羽生,梁羽生说自己父亲被人诬告而遭羁押,家人写信唤他回乡救人。彭荣康说:“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剿匪反霸群众运动,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梁羽生听从劝告,逃回香港。不久,他父亲陈信玉被杀。^[10]

由此变故,原本两人的一腔热情被当头浇了冷

水,生活的不幸给两人心理上所造成的巨大落差可想而知。如果说,感情纠葛、事业上的不如意仅仅是人生中的小挫折的话,那么,父亲的冤死则是沉重打击,这造成了两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痛楚。在经历了如此惨痛的人生之变之后,他们那种困惑、无助与无奈的心态绝不亚于先前提到的那些南来文人的。这可通过其后创作的作品反过来验证。如两人的首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及《书剑恩仇录》都塑造了侠肝义胆的英雄形象,但显然这些英雄身上的凡俗特征要大于超人特征,他们都有着明显的人格缺陷,对未来的看法都带有悲观的色彩。前者描写侠客娄无畏深陷情感的纠葛之中而始终无法解脱出来;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他曾表现出相当的怀疑:“晚间听燕山的野兽嘶鸣,松涛过耳。不觉绕室而行,思潮起伏,不是‘为谁风露立中宵’,而是想着自己的身世和今后的出处,想着,想着,不觉对‘七首会’所采取的暗杀手段起了怀疑,但又不知道除了暗杀还能采取什么手段?这样,思想打了一个一个的结,苦闷加上苦闷,……”^{[11](P74)}后者则极力书写红花会首领陈家洛在处理与乾隆皇帝关系时的优柔寡断,尤其在最后对决之时,对于是否要杀乾隆,他因无法决断而最终丧失良机。在小说的结尾,金庸以诗文表达了前路茫茫的失落:“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12](P801)}很明显,两人不约而同地大肆书写悲苦之意,与其人生遭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鸿沟,因此,在满腔报国热情遭到毁灭性破坏之后,作家创作心态中的英雄末路的情结是比较明显的。表现在小说中,便是曾经的辉煌与最终的消隐或死亡,往往令新派武侠小说充满着悲怆之感。武侠小说中总能出现锄强扶弱的英雄,这令小说充满着豪迈的英雄叙事的意味,而通过这样的幻想也搭救了在现实中失意的人们,使之能以移情的方式、以英雄的身份介入对历史与政治的重构当中,这不啻对他们的心灵是极大的抚慰。而将希望寄托于英雄的做法,无疑也体现了作家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救世理想。但是,梦总有苏醒的时候,个人或少数精英的力量,在滚滚红尘面前,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历史上的这些英雄究竟何去何从,这是作家也无法解释的,正如他们无法看透香港与大陆的前途一样。他们无法把握自己在现实中的命运,自然也就

无法确定英雄在历史中的未来。这种对命运的惶惑不安导致他们并不能为英雄的壮举安排出理想的结局。于是,或者是让曾经叱咤风云的女侠隐身于荒郊野庵之中(《龙虎斗京华》),或者是让侠客消失在西去的路上(《书剑恩仇录》)。这具有时代特色的创作心态,也是传统武侠小说作家所不具备的。

三、新派武侠小说对旧武侠小说的继承

新派武侠小说是建立在传统武侠小说的写作经验上的,因此,不可忽视它对传统的传承。中国的武侠文学由来已久。只是在文史哲不分的先秦时代,中国的侠客们主要出现于史传中。如《史记·游侠列传》中所描绘的侠客。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武犯禁”。“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3](P518)}这显然是那个时代儒墨两家思想的结晶。儒家的孟子提倡“义”,向往“舍生取义”的崇高境界,而“义”则必须要符合他的“民本”思想,即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君主应凡事要考虑到百姓的利益,例如“独乐”不如“与民同乐”。而以尚武见长的墨家则突出了武力解决争端的思想,在不可调和的国家、民族矛盾中,有时必须采取武力才能解决问题。由此就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侠,他们凭借一身好武功,为报知遇之恩或解救百姓的危难而赴汤蹈火。这样的历史人物,成为先秦文学(把史传也列入其中)中第一批光彩照人的侠客。后世的作家对此多有想象发挥之作。如唐人的《虬髯客传》、《红线传》等。这与唐代自由奔放的社会风气有关,与唐代注重国防、崇尚武力的时代风气也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些武侠题材的传奇中,已经可以看到侠客们游走江湖,行侠仗义的特点。他们多来无影、去无踪,在危急时刻却总能意外现身,救人于困厄之中而不求回报。这样游弋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快意恩仇的游侠模式无疑为后代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人物意识及行为的范式。而在推崇勾栏瓦肆之欢的宋代,国力衰靡,是一个缺乏武力的时代,大凡民族矛盾,均以中原政权的屈服顺从来解决;至元代,中原完全处于异族另一种文化的统治之下;而明代的特务机构的兴盛,也表明了国家在道德、法制方面的严厉约束。在这几个朝代中,

清官形象超越了侠客而成为百姓的拯救者。如拯救窦娥的,就不再是及时降临的大侠,而是断案如神的清官窦天章;同样的道理,在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途中,能屡次救其于危急时刻的,必然是代表着天庭政权的众神,而不是没有“正式编制”的“齐天大圣”;梁山好汉流于草莽之中毕竟不是正理,于是最终都被招安,成了正规军。这样的观念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因西学东渐,社会风气逐渐又走向开放,此时大侠们才又开始大展身手。如随着《七侠五义》等古代小说的盛行,辅助清官的侠客形象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伴随着《卧虎藏龙》等现代小说的问世,游走江湖来解决人间不平事的侠客们则延续了唐代侠客的豪爽自由之风。

由此可见,从中国武侠文学的发展来看,侠客们除了一身好功夫之外,关键还是要看其出于什么目的来使用这样的功夫。追逐一己私利、为虎作伥,自然算不得侠客;但辅助清官办事、为百姓排忧解难,则定然是大侠所为。因此可以说,古代的侠义观是建立在民本思想上的。侠客的特征,除了要有能救人的武功外,还应在思想及行为上,都保持特立独行的个性,较少受官府的约束。

前人的创作启发了后人。梁羽生说:“我和金庸的小说在海外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对我而言,这个‘新’是在‘旧’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出来的。”^{[6](P9)}“我这个处女作的确是受到白羽的影响的。”^{[6](P9)}“唐人传奇对我的影响很深,我写的《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这一组以唐代为背景的武侠小说,就是取材于唐人传奇的,空空儿、精精儿、聂隐娘、虬髯客、红线这些虚构的传奇人物和真实的历史结合,让他们‘重出江湖’。”^{[6](P9)}金庸也不例外,他“八岁就开始读武侠小说”^{[9](P15)},在《大公报》任职期间也与梁羽生大谈武侠:“两人平日谈《十二金钱镖》、《蜀山剑侠传》……经常是眉飞色舞的。”^{[1](P36)}正因为有以往的这些积淀,二人方能在受邀撰写武侠小说时,很快地拿出了自己惊动文坛的作品。但两人一开始只是在报纸上针砭时弊、激扬文字的记者,当时“香港的大报或自命大报是不屑刊登武侠小说的”^{[6](P45)},他们也不会自觉地进行武侠小说的创作。虽出自名门,但鉴于传统观念中武侠小说的低贱地位,梁金二人只能“偷读”此类“闲书”。可以看到,在梁羽生与金庸的创作中,对传统武侠小说的一些技法的模仿还是存在的,如飞天遁地的惊人武功、吓人的邪派功夫等。

虽不得登大雅之堂,但当时民间的武侠小说的

读者基础已相当雄厚,南迁的移民带来了他们对于北方官白羽与还珠楼主的深刻记忆:“有许多新移民就因为要看武侠小说才买《新快报》,因为他们觉得小说的写法很像他们熟悉的‘北派小说’。”^{[6](P5)}武侠小说之受欢迎,是与其兼有多种形式的通俗小说的特长有关的。如言情、悬疑等因素,都是市民读者非常感兴趣的。如果仅仅是言情小说,则显得过于柔靡,悬疑小说强调逻辑推理,又不够热闹,唯有武侠小说,既有儿女缠绵、英雄气短的情节,也有冒险暗杀、拳来脚往的惊险,这对于生活在平淡生活中的百姓来说,不啻一剂强心针,能让他们快意于想象的瑰丽的世界。再如香港电影业的蓬勃发展也从侧面推动着武侠文化的发展。一些脍炙人口的岭南民间武侠故事被拍成了电影,广为流传。如1949年的《黄飞鸿》系列电影受到热捧,它使“武打设计真正作为一种固定的职务被确定下来。”^{[14](P79)}这时的黄飞鸿电影,在武打动作上以标榜真实武功而大受电影观众的欢迎。它摆脱了香港武侠电影那种舞台化、写意性的武打设计,开出了以真功夫表演而取胜的市场新路。^{[14](P79)}这些事实都反映了武侠小说潜在的巨大市场。但是,尽管当时的报刊上也“一直有武侠小说刊登的,不过故事和写作都很老套,老套到没有什么人要看”,^{[1](P36)}这自然便呼唤着一种与传统武侠小说截然不同的新的武侠小说类型的出现。

因此,在这样的文化需求中,新派武侠小说虽然受到旧派武侠小说的影响,但在思想观念上,它却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它表现为: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读者群体、创作主体的精神取向等条件的制约下,新派武侠小说体现出强烈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悲剧意识。梁羽生在《龙虎斗京华》的创作谈中说:“我要写的是历史的悲剧,在那种混乱的局势中,纵有真知灼见的英雄,亦只能是‘枉抛心力’而已。”^{[6](P40)}金庸则说,之所以在《书剑恩仇录》中写乾隆皇帝,是因为“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的”,“海宁……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12](P804)}可见,通过英雄的悲壮人生去书写悲剧情怀,这不仅仅是某个历史时代精神的折射,更是作家对历史及现实加以深入思考的反映。对于他们来说,江湖世界其实是现实世界的曲折表达,它并不是作家天马行空想象出来的产物,

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隐喻了主流社会的种种关系,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主流与边缘、男性与女性,等等。作家对江湖的书写,实际上还是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表达了某些看法及愿望。当然,作家实的这种介入是处于作品的隐性层面的,在显性层面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功招式、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则有效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使之得以在生活的重压下暂时解脱出来。可以说,新派武侠小说通过对传统文学类型的继承,使现代读者能够通过熟悉的文学形式及历史事件来获得关于现实世界的崭新的审美体验。正如罗孚所说:“尽管人人都知道武侠小说是以假骗人的,但人人甘心受骗,还要夸他们骗得好,骗得妙,更希望他们多多益善地善哄善骗。”^{[4](P46-47)}此处“甘心受骗”一语确是非常传神地道出了武侠小说对现世之人的魔力。在刀光剑影中,一切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疑幻疑真,它带给人的便是如此特殊的阅读快感。

四、新派武侠小说的式微

特定的时代造就了新派武侠小说。它经梁羽生与金庸之手,由产生而声势逐渐壮大。这无疑与人们渴望在英雄身上寄托自己在国家命运发生重大转折期时的思想情感有关。“香港人谈到正事,谈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和事来做教训,仿佛那些武侠小说,都是现代社会的《资治通鉴》。不是开玩笑,他们是谈得很正经的。这使人想到,查大侠真是治港的‘真命天子’。”^{[1](P37)}虽然是带有调侃性质的话,但它多少还是表现了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受今人推崇的主要原因,乃在于其与时代政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其后,新派武侠小说进入繁荣期,除了金、梁二人大量产出高质量的作品之外,古龙、诸葛青云、温瑞安、黄易等各具风格的武侠小说作家亦不断涌现;由此,该派小说的影响也从香港一地而扩展到世界各地。罗孚盛赞道:“无论如何,旧派的、陈腐的、奄奄一息的武侠小说,由金、梁创新而成为新派的武侠小说之后,已经历三十年而不衰,而且产生了国际性的大影响。这固然和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和华人流布有关,但也表现了它自身的生命力量。它的化腐朽为神奇,征服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峡两岸高级的领导人,是文学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它本身多少带有革命意义的一件大事。”^{[1](P37)}

然而,随着取消中心、强调众声喧哗的后现代

主义影响下的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生活的关注重点也在发生着极大的改变。在作家们的创作中,英雄却逐渐地远去,如金庸笔下的主人公,从光明磊落的大侠陈家洛,到圆滑世故的小流氓韦小宝,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心中逐渐增强的反英雄情结。类似地,在梁羽生的笔下,原本高高在上的英雄也逐渐体现出越来越复杂的人性。这固然是作家对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的愿望所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反映了作家心中这种英雄情结的逐渐淡化。这种转变与七八十年代香港社会更浓厚的商业气氛不无关系。再加上当南迁之人渐渐老去或离世,他们的子孙,已成为土生土长的港人,那种被迫远离故土的悲怆之感,还能剩下多少?所以,香港的文学环境变得更为商业化,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也随之变得更为凡俗化了。

此后,当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武侠电影逐渐取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以后,我们不难感受到新派武侠小说的穷途末路。那些影片剥离了作家苦心经营的政治悲剧世界,取而代之的,是光怪陆离的、被图像化的武功招式,还有强大的明星阵容、暧昧的性爱镜头,更是将原著庸俗化,并突出其娱乐功能。如改编自金庸《笑傲江湖》的影片《东方不败》,邀请了著名影星林青霞来扮演阴阳人、武林盟主东方不败,它表现的是阴阳人的情感纠葛,其实已大幅度地游离于原著之外了。该影片以特技凸现其武功的出神入化,从而在视觉图像上大大地取悦于观众。

至于当下的众多电子游戏开发商,更有将梁、

金庸小说中的躯壳剥离出来,开发相关电子游戏的,这就更是改变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原意,完全陷入感官狂欢的庸俗化境地中去了。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人们依然对武侠文化津津乐道,但当其只剩下堆名字符号与情节模式之后,那种催人泪下、引人深思的思想力量便丧失了。这时,武侠文化便只剩下庸俗而华丽的外壳,这足以引起我们警惕和深思。

参考文献:

- [1] 罗孚. 文苑缤纷[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 [2] [英]弗兰克·韦尔什. 香港史[M]. 王皖强,黄亚红,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 [3] 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 香港新文学年表(一九五〇—一九六九)[M].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 [4] 罗孚. 香港人和事[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 [5] 郑树森. 遗忘的历史·历史的遗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学[M].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 [6] 梁羽生. 笔花六照[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7] 方宽烈. 梁羽生情场失意词坛得意[M]//香港文坛往事. 香港:香港文学研究社,2010.
- [8] 冷夏. 金庸传[M]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95.
- [9] 彭华,赵敬立. 挥戈鲁阳:金庸传[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
- [10] 刘原. 去国怀乡,一世萍踪如鸿羽开宗立派,半生侠影是书生[N]. 南方都市报,2010-01-12(B03).
- [11] 梁羽生. 龙虎斗京华[M].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花城出版社,1996.
- [12] 金庸. 书剑恩仇录[M]. 北京:三联书店,1994.
- [1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线装书局,2006.
- [14] 贾磊磊. 中国武侠电影史[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粟世来)

Historical Generation and Declination of Hong Kong's New School of Kungfu Novels

HUANG J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ts,Guangdong ,Guangzhou 510507,China)

Abstract: The generation of the new school of Kungfu novels contains its necessity of times. In sharp opposition to political conflicts, the British Hong Kong Government adopted “no policy”, which made the literary context in Hong Kong subject to certain restrictions as well as relative freedom. This requires not only a writer with a keen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but also provides a larger space to their creative thinking. Meanwhile, a number of scholars from south filled with mind wandering in exile, expanded the imagination of a modern state and nation in their literature, showing a strong sense of tragedy. Due to huge family change, Jin Yong and Liang Yu-Shen also had a similar mentality. As positive heir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 certain “catalyst”, they eventually created new school of Kungfu novels. But after experiencing a boom period, this school genre has gradually declined, which is worthy of our careful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new school of Kungfu novels; literary context; creative state of mind; traditional culture